

DOI: 10.16750/j.adge.2023.11.006

从“领导”向“益友”绵延： 导生关系生成过程的自我民族志

韩葳巍

摘要：以自我民族志为方法“裸呈”“我眼中的导师形象之变”，发现自己与导师的关系经过了从权力、利益关系走向传授、合作和伦理关系的变化过程。认为处于过程中的导生关系既非不同角色的迭代，亦非当下事态的聚合，而是异质关系的绵延；直面导生关系的绵延状态、将“回望中前行”作为方法论、于日常瞻顾间实现双方心灵契合是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研究生；导生关系；自我民族志；绵延；生成过程

作者简介：韩葳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7。

一、问题提出

研究生教育肩负为国家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任，历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十四五”规划（2021年）、二十大（2022年）相继做出加快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部署。新时代语境中，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从重视规模增长、结构调整、制度完善等“宏观质量”内敛于招考选拔、环节优化、评价机制等“微观质量”，即研究生培养质量^[1]。导师和研究生关系和谐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础，理应受到重视。近年来，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对导师职责进行制度性规约，于促进导生关系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现实情况看，公开指责、断绝关系、法律纠纷、学生自杀等导生关系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导生间存在的道德底线坍塌、情感因素抽离、交往理性缺失、责任意识淡化、功利主义泛滥等问题不容忽视^[2-3]，和谐导生关系构建备受关注。

目前，国外导生关系研究聚焦于导生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模式及现存问题。导生关系是导师对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导、引导学生进入学术社区、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一种支持性、个人性的人际关系，外延涵盖学术关系、心理关系和物质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双主体二元模式、小组指导模式和两者兼具的混合模式^[4-6]。不合伦理的过分亲密、导师指

导不足和性别、种族、性向偏见是国外导生关系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7-8]。国内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厘定导生关系，澄清其内在规定、对象范围和基本特征^[9]；其二，通过问卷调查、量表测量等方法分析导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发现导师指导频率、方式、理念，学生学业情况、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导生双方的沟通能力和价值观念，师门文化、组会形式、同辈相处、课题数量等内部建制，学校类型、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均会对导生关系产生显著影响^[10-12]；其三，聚焦导生关系异化表征与成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导生关系逐渐功利化、庸俗化、工具化、淡漠化，表层原因是双方的期望偏差、权力势差、诉求冲突，深层原因是学术资本主义、审计管理主义、传统师道观念以及网络社会发展产生的负效应，应重建导生共同体、明确双方权责、改革管理制度、优化学术评价体系^[13-16]。此类研究多为思辨研究，少数采用观察、访谈与扎根理论等质性方法。

毋庸置疑，既有研究已较为完备，但囿于选取大量样本和抽象归纳总结等方法，对导生关系的“群像”着墨较多，鲜有研究能持续跟踪一个主体以勾勒和深描导生关系历时性变化的完整状貌，导致对导生关系生成过程知之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以“我眼中的导师形象之变”为线索，一窥导生关系的流变脉络，并以之对话理

论、关照实践，在重新审视导生关系生成性的基础上挖掘其对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启示，以期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1. 自我民族志

民族志 (ethnography) 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理解为一种“我”到异文化中做持久的田野考察后重返本文化，写作并发表作品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自我观：自我不再被视为自足和统一的“单子”，而是时刻受各种关系影响的分裂性存在，由此带来了对民族志中“我”的理解的转变：“我”不是绝对中立的，所谓民族志只是“我”建构出的文化表征而非文化事实；“我”不仅能观察异文化，亦可站在第三人称视角将自己作为对象反观自身^[17]。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民族志——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逐渐兴起。

自我民族志从字面上看可拆分为自我 (auto)、文化 (ethno) 和描述 (graphy)，顾名思义，是一种将自我的生活经验置于文化背景中进行反思性描述的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角色上要求研究者兼具局内和局外人双重身份，研究手段上主张观察、体验、思想等素材作为资料来源，研究内容上“裸呈”研究者自己的经历以便挖掘其中的文化意涵，叙述风格上多以第一人称写作^[18]。自我民族志强调内省后亲身经历的书写，为洞悉导生关系生成过程提供了窗口，契合本研究的目的；同时，相较于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尚未给予该方法以足够重视^[19]，仅有林晓珊、王兆鑫做出了开拓性尝试，但却重点探讨教育与文化再生产^[20-21]；第三，笔者本身就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与导师朝夕相处三年之久，且有写日记习惯，加之留有与导师的微信聊天记录，自我民族志方法似乎是首选。综合上述三点，笔者认为自我民族志是较为合适本研究的方法。

但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十分冒险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指责其因太过自恋而无法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另有学者认为其完全依赖亲身经历而忽视对文化的分析与解释^[18]。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邀请同

门两位同学共同叙事，在多主体参与中避免“自我膨胀”，并从学理与实践两个维度解读笔者的亲身经历，增强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案例介绍

在呈现亲身经历前，还有必要对“我”进行简要介绍。我于 1997 年出生于河北北部的一个小城市，由于自身努力不足，加之本省人口众多、竞争激烈，高考成绩平平无奇，2016 年勉强被一所广西二本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录取。因身材瘦小，在实习中无法适应高强度体力劳动，便萌生了考教育学研究生的想法。至于缘何选教育学，究其实为从小数学不好，而教育学是为数不多不考数学的专业。考研过程异常顺利，我被山东一所非师范类综合院校录取，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目前，我已“申博”成功。作为一名跨专业学生，能成功申博实属不易，我在反思既往经历中发现或许正是因为导师的缘故才让自己有了今天这番“成就”，也发现我与导师的关系经历了多重变化，从她在我眼中的形象逐渐由领导、老板走向老师、同事和益友，可见一斑。

三、自传书写：我眼中的导师形象之变

1. 领导：权力想象与出场

2020 年 9 月，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研究生生活。在一门名为“人文教育专题”的课上，我与导师初次邂逅，当时她身着紫色旗袍，看上去温文尔雅。待同学们自我介绍后，她点评道：“故事的背后是情，情最能打动人心，所以刚才 L 同学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蔼可亲又具深刻思想的她强烈吸引着我。半月后举办导生双选会，我如愿进入师门。

双选会前，师兄师姐明哲保身，不愿过多评价各位导师，但双选会后，关系基本锚定，传言蜂拥而至：“你导师很严厉”“她好像还在课上发过火”……听闻此言，我闷怀顿生，因幼时父亲盛气凌人，而“严师子敬”的传统师生观赋予父权的正当性，加之此前每位老师都出奇严厉，形成了畏惧老师这一“惯习”。我安慰自己传言非事实，要相信自己作为局内人的亲身经历而非门外汉的雾里看花。但同门师姐在一次聚餐中也对导师做出类似

评价,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传言多少为我保留一丝希望,那同门师姐的善意提醒无疑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手机上推送的各种导生矛盾新闻也时常于无形中平添我的精神压力。在“传言”“惯习”与“技术”交织作用下,一副导生权力势差图景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

不久之后,导师召开第一次组会欢迎我们的到来:“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家”在言说亲密的同时也暗示她重新厘定社会舞台中台前幕后的布局,同我们交往不再被视为台前之事,戈夫曼口中的“印象整饰”失灵,矛盾发生,权力也借由矛盾从想象步入现实。由于不熟悉报销流程,我未在规定时间内将单据送到财务室。导师在一次课间突然问起,当听到我说“我下午去送(单据)”时,她先是一怔,然后瞳孔放大,用尖锐的声音甩出一句“你这孩子怎么做事的?”之后就愤然离去,独留我在鸦雀无声的教室中与其他同学面面相觑。学期末,同门因订婚欲请假回家,又担心时间太长导师不批,就擅自修改假条上的请假日期。拿给导师签字时,她瞬间从座位上站起,以一种俯视的姿态盯着同门的眼睛冰冷地说:“我不会签这个字,出什么事你自己承担责任!”当天下午,导师召开组会,重申师门规章,告诫大家若不能接受,可申请更换导师。组会快结束时,气氛稍显缓和,导师说自己有些情绪化,以后大家对她有任何意见也可直接提出。组会结束后,同门不断翻白眼并抱怨:“净说没用的,谁敢换导师?”这一真实想法只能暗流涌动,表明导师权力的真实在场。

2. 老板:夹缝之中博利益

随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互动日趋深化,来自行政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的经济利益不断涌入大学,大学成为高资本附加型机构,于其上生成的导生关系也呈现经济性特征。研一下学期,我们开始作为“理性经济人”在权力的夹缝中同导师展开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表征的博弈。

导师在这学期会请我们帮忙打印资料,却常忘记转账。若数额较少,我们一般等她想起再说,若数额较大,又碍于师生情面无法当面算账,便会在聊天中抓住各种机会有意向她传达“这个月的补助

还没发”“最近家里没给生活费”等手头紧张的信息。导师还计划在本学期同每人合作一项研究,以提升我们的科研能力,我们自然同意,但更希望借此获得申请奖学金的筹码——发表论文。或许正如桑德尔那个待价而沽的隐忧所示,过去30年间最致命的变化莫过于市场及其价值观进入了本不属于它们的领域。慢工出细活的科研在急功近利的市场中居于劣势,随评奖日期的逼近,迟迟未出成果的我们焦虑不已。同门欲“购买”论文,而我有志于读博深造,不愿留下“污点”。导师觉察到大家积极性不高,只得暂缓合作之事,建议我们先用Citespace软件写一篇文献综述并及时发表。

除金钱利益外,同导师的博弈还涉及心理和精神利益,其中心理利益的博弈围绕“相对剥夺感”展开。“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将自己与某参照物比较后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而产生的以不满和怨恨为表征的消极情绪体验^[22],在其他导师帮学生联系杂志发论文、给学生经济补助、与学生聚餐的衬托下,常安排大家搜集资料、用Citespace作图、写文献综述的导师显得“不近人情”。我们认为这是自家事,不能让外人看笑话,所以会在舍友面前刻意美化导师:“她很忙,不忙的话也会请我们喝奶茶。”但在师门内,我们常团结一致地向导师传达出对其他师门的羡慕:“听说W老师带学生发了一篇文章”“L老师上周带我们宿舍的同学去他家吃饭”。导师也明白言外之意,在师姐毕业答辩结束后对大家说:“其实选我当导师很吃亏,论文写得不错也难得优秀,一般是答辩组长的学生得此殊荣。”

精神利益的博弈则围绕意义时间展开。意义时间有别于物理时间,不是年轮的增减,而是心灵感知的生活节奏,关涉人的精神世界。由于心理上认定导师无法像其他导师一样提供更多帮助,我们决定自力更生,而一旦有此想法,为她“打工”的每一秒都异常煎熬。为避免“随叫随到”和“让压力遍布全部时间”,当导师布置任务时,以“家教”“作业太多”“身体不适”等理由推迟“交工”时间成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学期末,导师要求在一周内将纸质资料录入Word文档并导入Nvivo软件,我们以尚未完成期末作业为理由要求延长时间。但导

师了解到我们的作业并不多，她回应道：“我记得只有 W 老师有作业，实在不行的话，把手头其他事先放下。”气氛骤然凝固，导师又补充道：“假期交流不方便，我们得抓紧时间。”又是良久沉默。导师为缓解尴尬而做出妥协，表示可将时间放宽到半个月。半月后，她竟一直未“验收”成果，我们也未主动汇报，毕竟如同门所言：“做完这件事，还会有更多事，用惯我们会一直用。”此后，导师将各项任务的约定期限都记在备忘录，我们失去了钻空子的机会。

3.师傅：信其道，向其学

研二上学期是导生关系的转折点，在治学、处事等几项事件的影响下，我逐渐感受到导师的人格魅力，与她缔结了信道而愿习的师徒关系。

当课程学习告一段落，接下来面临毕业论文开题。导师在学期初同大家分享了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缘由：“大家都知道我是农民工子女，但不知道的是我不会说普通话，在数学课上把 7 读成‘吃’，老师对我说的那句‘吃你个头’至今仍记忆犹新。既然语言乃存在之家，那很多农民工子女便同我一样在城乡迁移中由于语言流变而身心异域，失缺精神家园，所以我非常关注他们的语言与自我认同。”听完这番话的我心头一颤，领悟到研究可以是感性、温暖和有情怀的，明白了深埋于研究者内心的困扰可能蕴含人类共通的问题。那夜我彻夜未眠，回想二十多年的生活，发现自己在性别气质上“越界”而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正是那个困扰我已久的课题。后来，导师向我推荐了一些性别研究的著作。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可以用一种严谨的学术话语所表达，体会到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转变，更重要的是萌发了一种已经加入学术共同体而为性别公正贡献力量的使命感。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导师，她欣慰地说：“性别社会学赋予你一种审视过往经历的视角，帮你重拾了心灵的安宁，但也要警惕，要基于自我而不要囿于自我。”开题答辩中，我的选题受到各位老师的一致认可。我逐渐对导师有所改观，认为她在治学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并在她的鼓励下踏上性别研究的道路。

除治学之道外，导师还向我展示出她的处事之道。师门每学期都会组织读书沙龙，布置场地的任

务落在了我这个师门中唯一的男生身上。某次沙龙结束后我忘记归还钥匙，导师在几天后突然打电话说负责管理钥匙的 L 老师发现钥匙失踪，问是否在我这里。本想着又是一顿批评，但得知实情的导师出乎意料地教我如何向 L 老师道歉：“你可以准备一些特产向 L 老师道歉，他不要的话就直接放在桌上，他也不好追出来。”还说，“只有学问是不够的，在这个人情社会里还要学会做人。”我在经验上十分同意导师的做法，而当读到《人情、面子、关系网》一书时找到了学理依据：何谓会做人？在中国，人是关系中的人，会做人，即能够洞悉人情社会中“互欠”这一运作逻辑的人，就此而言，导师让我送特产不是因为 L 老师缺少，而是希望令他产生“欠”的心理体验以使人情流转，便于下次请他帮忙。当认识到了国人的行动逻辑，对导师所传处事之道便愈加认同，心中感叹学术即生活，她还真是会活学活用。

4.同事：合作研究孕平等

导师同我们合作研究的计划在研二下学期才正式提上日程。我同她合作一项以扎根理论为方法的育人目标研究，她建议我先独自对资料进行编码，每周交流一次。看到每次交流时我都只懂机械地记录，导师便说：“研究是一个‘探’的过程，是我们一起讨论，不是我的一言堂。”“探”字道破了科学研究特性：未知性。在福柯看来，占有知识即拥有权力，而科学研究的未知性使导生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有知识而只能是发现知识，弱化了导师的权力，导生关系趋向平等。资料编码初步完成，下一步是借助 Nvivo 软件生成图表。从小接触电子设备的我很快掌握了软件的使用方法，但导师却显示出自己的“笨拙”，时常向我请教在我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打不开这个软件？”“怎么我做出来的图这么丑？”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缺乏变动，年长一代将自己积累的生活智慧传递给年幼一代，形成对后者的天然权力；而在以流动与变化为底色的现代社会，后者不必然走前者走过的老路，且更具适应新事物的能力，文化传递从“长传幼”变为“幼传长”。当我“反客为主”充当教师角色时，导师权力的正当性再次受到冲击，导生关系更加趋于

平等。此后的合作中，导师非但从未剥夺过我表达观点的权利，还常询问我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我也因自己的观点被导师采纳而欣喜。日渐增强的自我效能感坚定着我读博深造的信念。

临近学期结束，为防止我泄露资料，导师提出要同我签该项研究的保密合同。合同的本质是契约，而契约是主体之间依据自由、公正、平等原则达成的合意，导师择此做法，侧面反映出她不再依靠权力管理学生。管理的正当性基础从合理性走向合法性，也表明她已在心目中将我视为同她一样的主体。导师说原先有学生“盗取”了她的研究成果，她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平时她与我交流时会特意紧盯我的眼睛以寻求心灵共鸣，但她这次却望向窗外，声音微弱，一副鼓起极大勇气的样子。据我所知，导师从小生活在农村，那个年代的农村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世代定居，彼此知根知底，靠熟悉、亲密、信任等情感维系关系，“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行了，签字画押反而伤和气”；但经济发展、城乡迁移与全球化推动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生存于其中的人“不知他人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但又怕空口无凭，契约应运而生”^[23]。嵌入社会转型浪潮中的导师因遵循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吃了亏”而打算签合同，但同时又无法完全适应陌生人社会中抽空了情感的人际关系，最终流露出难以启齿的神情。但或许是感性战胜了理性，导师到毕业时也未重提此事。

5. 益友：共同体中生伦理

时间如白驹过隙，研究生生活接近尾声。悬临在头顶的“毕业”令我逐渐领悟到自己与导师共处于同一共同体，导生双方均成为相互关怀、互担责任的伦理主体。

研三上学期疫情肆虐，学校封闭管理，一直自筹生活费的我无法外出做家教。某天深夜，在我看着微信余额发呆时突然接到了导师电话：“疫情没办法出去打工了吧！”说罢，她转了一笔钱给我。我十分抗拒，认为金钱会玷污我们纯洁的关系，纵然她一再尝试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说服我，我仍不愿接受，逼得她只能以发火相威胁。在有些许不情愿又有些许感动的复杂心情中，我点下了收款按钮。

挂断电话，温暖之感涌上心头，这笔钱与其说是物质救济，毋宁说是精神救济，令我因离家在外无所归依的干涸心灵重现灵动。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将近，尚有许多问题需请教导师，但却意外得知她感染新冠，此前得知她生病，我更多的是“庆幸”任务量会减少，但此次，心底竟升起一丝担忧。听闻同门欲请导师指导论文，我急忙建议互换论文，互相修改。诺丁斯认为，担忧既非出于自己的目的，也非出于对他者的怜悯，而是两个主体相遇时产生的一种为他人着想的关怀之情^[24]。从道德自然演化的意义上讲，孺子落井，人皆有不忍之心，移情与拟他性同心是关怀的心理基础。导师常提起自己求学时既要谋生又要做学问的窘境，相似的境遇而产生的移情是她解囊相助的原因；基于自己生病经历而产生的拟他性同心使我不忍因学位论文而影响导师康复，亦不愿同门打扰她。两个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因关怀而内在联结，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相互关怀是人之常情，互担责任是更能彰显人之为人的道德准则，在研三下学期同导师组织读书沙龙的过程中，我与她从关怀的主体蜕变为“为他的主体”，承担起对彼此的责任。记得导师在我们刚入学时就表示自己非常希望把沙龙办好：“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要求大家参加就应让大家有所收获。”那时的我不以为意，多半是从网上找几篇书评蒙混过关，在讨论问题时三缄其口。当我深入参与沙龙组织后逐渐发现，书籍挑选、日程安排、简报撰写，无一不凝结着幕后工作者的心血。某次，我与导师因筹备第二天的沙龙忙到深夜，回宿舍的路上她说：“只要有一个学生愿意参加，我就会坚持举办，好的导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灵……如果说有什么私心，可能是学生的陪伴让我觉得思考不再是一个人的事。”“将人塑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25] 当人从共同体中脱嵌，彼此隔膜和冷漠就会成为常态。导师举办沙龙的目的是希望重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但她首先强调自己作为导师而肩负的丰富学生心灵的责任，即便我们敷衍的态度很难满足她的需要也不改初心。昏黄的灯光下，我第一次发现导师的脸如此沧桑，它的背后仿佛还深藏着

许多不为人知的殚精竭虑。此时，导师的脸俨然成了列维纳斯口中的“他者的面孔”，超越了我对它的觉知，将我带入外在性的无限之中^[26]。面对这种无限，一种近乎强迫的责任感拷问着我的内心：“你为何对待沙龙总是如此敷衍？”此后，我开始承担起自己作为学生的责任，向导师建议改进沙龙形式，在冷场时主动发言、带动气氛，希望能在离别之前让她感受到来自学生的温情。

责任除“为已的责任”外还有“为他的责任”，前者强调作为独立主体的自我有能力和义务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此语境中就算有他者的位置，也是将自我利益置于他者利益之前，而后者强调将自我利益后置，即我对你好本身就是目的，而非为换取同等回报^[26]。深受导师“面孔”感召的我开始同她一样将对方置于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打破了自我与他者的藩篱，为三年的相遇、相识、相知、相随和相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对话理论：再论师生关系的生成性

故事讲到这里将告一段落。上文通过若干片段的陈铺，勾勒和描绘了一幅导师形象从“领导”向“益友”变化的图景，展示出师生关系从权力、利益关系走向传授、平等和伦理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如何看待这种生成性？该问题关涉师生关系的内在规定。

内在规定也即内涵，在逻辑学上指一个概念所能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即事物究竟“是什么”^[2]。早期，有学者按结构主义观点将师生关系作类型化处理，有五类型说：良师益友型、相爱相杀型、任务型、过场型、怨恨型，四类型说：权威型、和谐型、松散型、功利型，以及三类型说：老板雇员型、平等朋友型、父母子女型，这些观点的背后暗含一种师生关系是各种关系类型之集合的观点；另有学者受因果思维影响，重视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将师生关系看作多重因素的嵌套。以上两种观点固然便于把握师生关系的本质，但因缺乏历时性视角而略显机械和僵化。此后，学者逐渐认识到师生关系时刻处于过程中，如管岭等人认为只能在理性思考中离析师生关系，现实生活中的师生关

系是师生双方链状、循环的连续交互的动态过程^[2,27]。师生关系具有生成性成为主流观点，强调师生关系是不同角色的迭代与当下事态的聚合。

1. 师生关系是不同角色的迭代？

师生关系是不同角色迭代的观点又可按视角大小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前者认为导生在社会变迁背景下扮演与此前迥异的角色，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化传递模式的转变呼吁导师从权威者走向合作者^[28]，受功利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导师从“师父”和“师傅”变为“老板”^[29]，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使导生均化身为“理性的经济人”等；后者认为导师和研究生扮演的角色会随双方相处时间的推移而线性流变，如导生冲突会经历潜在的对立或失调、认知和人格化、行为意向、行为、结果五个阶段，导师和研究生在五个阶段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30]。

从本研究看，导师在笔者心目中的形象确实经历了从“领导”“老板”到“师傅”“同事”“益友”的变化，表明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此观点无法解释：为何每种角色内部还存有多重角色？譬如，第一阶段笔者虽视导师为“领导”，但她施展权力的目的是引导我们积极主动和讲求诚信，与其说是“领导”不如说是“严父”，导师在组会结束时袒露自己情绪化并告诉我们可向她直接提出意见，此时的她又作为“朋友”出现在大家面前；再如，第二阶段的导师在笔者眼中是“老板”，但她也建议大家用Citespace写论文并及时发表，表明她并非仅将大家视为博弈对象，而是换位思考甚至为满足学生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扮演类似于“慈母”的角色；同理，后三个阶段的“师傅”“同事”“益友”也仅是导师的主要和显见角色，不排除还存在诸多次要和隐蔽角色的可能。笔者以为，将师生关系理解为不同角色的迭代仍是一种结构主义视域下的类型观，只是将各种共时性的类型以历时性的方式串联起来，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机械和僵化，尚未触及师生关系的根本。

2. 师生关系是当下事态的聚合？

认识到将师生关系视为不同角色的迭代过于机械和僵化，有学者转而强调师生关系是当下事态的

聚合。常海洋等人指出,既然世界由事态构成,事态凝聚为事物,而多数事物最终的意义都在其相应的事实样态上,那作为一种事物的导生关系同样呈现为一种事态(Sachverhalte)^[31]。Sachverhalte 也被译为“原子事实”,源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指某种状态下的事物^[32],维特根斯坦意在以此概念强调事物不是传统哲学所理解的实体性存在,而是诸多具有完备性、饱满性和自足性的“此刻”“当下”“目前”的聚合。将导生关系理解为当下事态的聚合,意味着导生双方任何一刻的交往都是独特的:既不代替过去,也不指引未来,从而否定了导生关系是不同角色的迭代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因为当我们言说角色时,必然会武断地将导生双方独一无二的当下交往归为种和类,而这恰恰遮蔽了事态的多元异质性。

从本研究看,导生关系是当下事态聚合的观点在解释上文提到的“为何每种角色内部还存有多重角色”的问题上更具说服力,但仍要进一步追问:导生关系的每个当下真的既不代替过去,也不指引未来吗?第二阶段在“夹缝”中同导师缔结博弈关系,是否暗示着第一阶段权力关系的渗透?第三阶段传授关系的正当性基础只是导师人格魅力而不掺杂权力吗?第四阶段的平等关系是否完全排除了第二阶段的博弈关系?第五阶段的伦理关系不是建基于第四阶段的平等关系之上吗?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借助“绵延(durée)”这一概念。

3. 导生关系是异质关系的绵延

“绵延”由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提出,是指事物的过去融化于现在并向未来持续地涌进,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每个当下都包含着过去又预示着未来”^{[33]77-78},真实的事物在这种一气呵成的过程里如河流般生气勃勃、健行不息。该概念关涉一种新的时间观,即时间不是一维流逝而是内在融合的,不是均匀同质而是有浓有淡的。

当以“绵延”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时间观审视导生关系便会发现,导生关系确实存在于每个独特的当下,但这些“当下的当下”仍无法摆脱“此前的当下”之影响,正是在此前权力关系的影响下我们才同导师在“夹缝”中博弈,传授关系的正当性基

础由权力和人格魅力共同构成;并且,这些“当下的当下”同样融化、渗透、弥散进“未来的当下”,作为导生关系转折点的传授关系刺破了权力、利益这些负面关系的同一性,昭示出导生关系向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开敞。“那种昨天而今、今天而明的看法只是空间思维在时间观念上的作祟”^{[33]78},既不存在一个孤立的可以与最近的过去、将来分割开来的当下时刻,也不存在所谓实体性和原子性的事物。就此而言,导生关系的内在规定实为种异质关系的绵延。

五、实践关照:对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启示

若将导生关系看作异质关系的绵延,直面导生关系的绵延状态、将“回望中前行”作为方法论,以及导生双方在日常瞻顾中实现心灵契合将成为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可能路径。

1. 直面导生关系的绵延状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将导生关系视为一个机械和僵化的整体,以至在和谐导生关系构建的问题上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例如,当注意到导生关系的权威性时强调双方发挥主体间性,当注意到导生关系的经济性时强调建构一元主义雇佣关系。这些建议无疑可切中时弊,但却忽视导生关系的复杂性。进言之,导生关系的复杂性如上文所言不仅体现为各种独特的当下事态的聚合,还体现为异质关系的绵延。各方教育主体首先应重构导生关系想象,廓清导生关系的生成性并以绵延的观点把握之,以便从新的视域关照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可能路径。

2. 将“回望中前行”作为方法论

认识到导生关系绵延状态仅是基础,还需将“回望中前行”作为构建和谐导生关系的方法论。“回望中前行”这一简短的时间性表达与“失败乃成功之母”“温故而知新”等生活智慧有着同样的方法论基础^[34]。人们常在失败时反省自己,也会在某个时刻“顿悟”此前无法理解的某个思想、观点或事情,这些都表明过去的经历并没有过去,而是在回望中不断被召唤至当下,且以当下的视角赋予其以新的意义。同理,导生关系也需回望,正如笔者在最后一个学期因看到导师沧桑的面孔而萌生出“此前的

自己为什么对待沙龙如此敷衍”进而生成责任感一样。再如，导师之所以在入学时对笔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带点事后分析的味道，或许正是因为她与笔者一样均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之人，而这亦是笔者立足当下回顾过往而得出的结论。在回望时，笔者如同牛反刍般将过往咀嚼出了新的味道，导生关系由此变得丰盈和厚重。同时，“回望”不仅会积累与成就当下的此在，还会伴随前行——一种对未来的筹划，正如笔者在生成责任感后决定在未来弥补对导师的亏欠，向导师建议改进沙龙形式，在冷场时主动发言、带动气氛。“回望”是意义的反刍式积累，“筹划”是意义的补偿式叠加，在“回望”与“筹划”螺旋式前行中，导生关系的意义不断充实，而该过程同时也是通达他者的过程，因人是群体性存在，“回望”与“筹划”必然伴随他者身影的浮现。在“回望”与“筹划”中，笔者最终领悟到导生关系中“关系”的真谛，即导生双方实为共处同一物质与精神共同体的存在，承担起了作为学生对导师应负的责任。可见，“回望”与“筹划”的根本在于刺破原子式的孤立自我，在共享的意义世界中实现自我与他者、研究生与导师的相互通达，成为海德格尔口中的“共在”。

3.于日常瞻顾间实现心灵契合

当下，现代性时间结构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由于现代性的时间观通过与传统相互区别且以贬抑传统价值的方式得以确立，“过去不值得留恋”“明天会更好”等日常观念不断形塑着现代人的主体建构，人们在与过往的割裂中如阿尔斯海默症患者般面临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日渐膨胀的“自我”也难借“回望中前行”实现“共在”，导生关系亦是如此。对此，导生双方首先应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瞻顾，不断打量既往相处的经历，并以此为参照寻求未来相处方式的改进；其次，积极对话，敞开彼此在瞻顾中组建的有关导生关系的意义世界并将其投向对方，通过倾听与言说实现意义的融合；最后，允许差异存在，就未交叠的意义而言不必强行达成共识，而应做到求同存异，将之交由未来的瞻顾，坚信双方的视域会在不断瞻顾的过程中趋于融合。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不是催生以量计算的科研成果，也非心照不宣地求名夺利，而是“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是导生双方心灵的契合。心灵是意义的居所，意义组建的重要方式是日常生活中的瞻前顾后，重视日常瞻顾，无论于构建和谐导生关系，还是于解蔽受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影响的异化的教育，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致谢：为保护个人隐私，此处不便透露导师姓名，但仍要感谢导师三年来的辛勤栽培。以此文为鉴，纪念与导师的相遇、相知与相伴。

参考文献

- [1] 宋成. 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学关系: 影响因素与对策构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3): 9-14.
- [2] 刘志. 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关系问题何在——基于深度访谈的分析[J]. 教育研究, 2020(9): 104-116.
- [3] 郭友兵. 研究生师生关系的异化困境及其伦理超越[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2): 6-11.
- [4] MARITZ J, PRINSLOO P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on becoming and being a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the role of capital[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5(5): 15-26.
- [5] RUDICK C K, DANNELS D P. "Yes, and...": continuing the scholarly conversation about mentoring in higher education[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2019(1): 1-11.
- [6] PARKER R A. Learning community approach to doctoral education in social sciences[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09(1): 122-133.
- [7] MANATHUNGA C. Intercultural doctoral supervision: the centrality of place, time and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J].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1): 25-34.
- [8] RASHEE S, ALLEMAN A S, MUSHONGA D, et al. Mentor-shape: exploring the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of black women in doctoral programs[J]. Mentoring & tutoring: partnership in learning, 2018(1): 11-19.
- [9] 刘志. 导生关系的内在规定、对象范围及基本特征[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12): 4-9.
- [10] 冯蓉, 牟晖. 博士生导师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北京市 10 所高校的调查[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4(2): 54-58.
- [11] 王文文, 郭宁, 王扬. 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6): 76-82.
- [12] 杜静, 王江海, 常海洋.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导学关系——我国博士生导师导学关系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2(1): 43-50.

- [13] 张世昌, 张博. 当代研究生师生伦理关系异化之追问[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2): 30-35.
- [14] 李全喜. 从导学逻辑到利益逻辑: 研究生科研中师生关系异化的生成机理及本质变迁[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6(12): 64-68.
- [15] 林杰, 刘业青. 重建巴别塔: 导生隐性冲突的生成与归因[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2): 73-83.
- [16] 马焕灵. 导生关系转型: 传统、裂变与重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9): 17-22.
- [17] 康敏. 论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中的“自我”意识[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4): 57-63.
- [18] 蒋逸民. 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4): 11-18.
- [19] 魏亚丽, 孙杰远. 自我民族志的原理及其对教育研究之观照[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1): 71-80.
- [20] 林晓珊. 境遇与体验: 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7): 15-23.
- [21] 王兆鑫. “走出乡土”: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J]. 北京社会科学, 2020(5): 26-36.
- [22] 熊猛, 叶一舵. 相对剥夺感: 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3): 438-453.
- [23] 冯建军. 道德教育: 如何面对陌生人[J]. 教育研究, 2022(7): 42-53.
- [24] 卜玉华. 诺丁斯关怀伦理思想的新意[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30-36.
- [25]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M]. 张成岗,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6-7.
- [26] 孙庆斌. 为“他者”与主体的责任: 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伦理诉求[J]. 江海学刊, 2009(4): 63-68.
- [27] 管岭. 试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师生互动关系[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9): 284-287.
- [28] 刁承湘. 现代社会呼唤现代导师[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0(11): 22-25.
- [29] 徐岚. 师父、师傅还是老板——从教师角色看研究型大学师生关系[J]. 高校教育管理, 2013(3): 33-40.
- [30] 蒋文宇, 朱晓琦, 陈振中. 走向善治: 导生冲突的问题检视与纾解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10): 48-54.
- [31] 常海洋, 杜静. 走向交往理性的研究生导学关系: 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高教探索, 2023(2): 94-99.
- [32]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郭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94-95.
- [33] 伯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34] 孙彩平. 回顾与前瞻: 意义世界的时间现象及其德育意涵[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8): 18-26.

(责任编辑 刘俊起)

DOI: 10.16750/j.adge.2023.11.007

关于导生关系主体问题的再思考 ——导生共创观

张先璐

摘要: 导生共创观的提出试图实现从有界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转换, 在关系理论与结构存在论的指引下回答“导生关系中何者为主体”的问题, 为破解导生矛盾提供新思路。在导生共创观中, 主体并非导师或研究生, 亦非导师与研究生并列构成的双主体, 而是导生双方共创而成的导生共创体。导生共创观主要体现在角色共创、行为共创与意义共创三个方面, 贯穿于导生关系的学术传承与创新、情感交融、义利融通与权责共构四重维度中, 对构建和谐导生关系、推动研究生

教育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导生共创观; 导生关系; 研究生教育

作者简介: 张先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导生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关系, 和谐导生关系是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育哲学的视角下, 部分导生之间存在矛盾的根源是双方对“导生关系中何者为主体”这一问题的认识模糊或观念上的不一致。这导致了导生双方对各自在导生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利、应负的责任以及交往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导生关系中究竟何者为主体? 这既是一个因上述矛盾而生成的实践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此, 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导生双主体、